

“可沟通城乡”：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城乡关系新未来

郑素侠 牛斌花

摘要：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可沟通城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导致城乡之间“连而不通”，或者“有连接无沟通”。数字传播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在城乡之间建立了数字化连接，有望促进城乡关系向“可沟通”转型。从空间社会学来看，“可沟通城乡”具有地理空间“可连接”、信息空间“可互哺”、意义空间“可共享”的空间特征，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形态。面向现代化的“可沟通城乡”建设，需要基于数字化、智能化媒介搭建城乡公共交往的地理网络、信息互哺的传播网络和价值认同的文化网络，塑造城乡“数字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可沟通城乡”；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4-016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中国未来的城乡关系和城乡形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在社会全面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今天，数字传播技术不均衡应用带来的城乡数字鸿沟仍未弥合，且逐渐拓展至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智媒技术的“新数字鸿沟”。城乡公共交往的物理空间四通八达，但信息空间“连而不通”，或者“有连接无沟通”，城乡分割、城乡隔膜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存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作为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的现代传播媒介如何嵌入城乡关系，在城乡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形塑城乡共同体？本文提出“可沟通城乡”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形态，并探讨现代传播媒介连接城乡、打破区隔、促进信息互哺、塑造城乡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为破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城乡关系失衡、城乡认知隔膜、城乡公共交往缺失等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并为学术界理解数字时代的城乡关系提供新视角和新工具。

一、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城乡关系“可沟通”

城乡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城乡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为动力^[3]。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城乡关系对现代化的影响甚为深远，“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

收稿日期：2024-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城乡信息分化及其治理研究”（23AXW007）。

作者简介：郑素侠，女，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01）。牛斌花，女，新华通讯社-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1）。

改变”^{[4]618}。城乡关系的平等、互哺与和谐,是实现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一)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城乡关系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城乡关系的断裂、阻滞或“连而不通”,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阻碍;互联互通、沟通高效的城乡关系,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空间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实现了从分离、对立到协调、融合的历史性转变,迎来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融合发展新阶段。我国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时期,正是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数字传播技术的去中心化和分享性特征,可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共享机制。但技术扩散的城乡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数字鸿沟,导致中低技能群体大规模失业,不同技能劳动力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发展机会不均等,社会流动性遇阻,甚至生产出新的社会分化——信息阶层分化^[5]。城乡之间的公共交往、信息沟通、文化交流遭遇无形的“数字区隔”。2021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并于2022年3月印发《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了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城乡融合问题时多次提到“共同体”,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4]557},并且“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571}。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培育城乡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城乡关系“可沟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从历史上看,部分国家因未能处理好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忽视了农业农村的发展,致使乡村经济逐步走向凋敝,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严重阻碍了现代化进程^[6],这是我们应吸取的教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巩固新政权,优先发展重工业,城乡关系从城乡互助转变为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城乡分化趋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推动城乡关系向“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转变,但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1984年以后,国家发展中心转向城市,“重城轻乡”使得城乡二元对立加剧。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自2010年开始城市发展高歌猛进,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关系出现失衡。2013年开始,党和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脱贫攻坚行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三大任务上。2017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2021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城乡关系几十年来的转型嬗变,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推进了现代化进程,而现代化也成为理解我国城乡关系在分离与融合之间转型嬗变逻辑的一大重要线索^[7]。但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城乡关系的紧张化,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呼唤国家权力合理介入并构建“友好城乡关系”,以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和谐状态^[8]。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路径,“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要义在于畅通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协调城乡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增进城乡之间的互动、对话与理解,建立城乡之间“可沟通”的新型关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动力。

(三)乡村的未来在于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与城市“可沟通”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并以乡村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为最终目标。

在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未来在于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与城市“可沟通”,走向与城市携手并进、互利共赢、共同繁荣、融合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数字化转型作为弥合城乡差异、促进城乡融合的有力手段,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刺激城乡公共文化生产,构建城乡共同体的新场域^[9]。已经“下沉”至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在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社会治理、乡村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县级融媒体中心、各大平台扶持的“三农”自媒体,正在将乡村社会全面改造成“数字化乡村”,并在城乡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搭建数字化交

往平台,激活城乡公共交往,增进城乡互动与交流,消弭城乡认知分歧,培育城乡经济共同体、交往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进而形成信息充分、传播通畅、沟通有效的“可沟通城乡”。作为“可沟通城乡”的“基础设施”,数字媒介在城乡沟通中发挥桥梁与中介功能,这不仅仅是其在重塑城乡关系、推进乡村现代化中公共性的体现,也可为我国新闻媒体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

二、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城乡关系的“可沟通”转型

在深度媒介化社会,数字传播技术不仅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连接,更是形塑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数字传播技术在城乡社会的深度应用,催生“数字化乡村”,赋能“新农人”返乡创业,并搭建城乡沟通的数字化平台,促进新时代城乡关系向“可沟通”转型。

(一) 互联网“下沉”催生“数字化乡村”

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扩散与嵌入,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结构和形态,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将乡村社会推向数字化转型的“十字路口”。一些 App 平台和直播软件以较低的技术门槛、较为多元的内容,迎合了村民的娱乐需求,迅速占领了农村受众市场,填充了曾经乏味、无趣的乡村生活。在短视频平台上,农民在闲暇之余获得了低成本的娱乐,参与了社交活动,实现了自我表达,还通过直播销售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赚取收入,电子商务和网络直播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的新常态。短视频被村民加以创造性运用,在展演长期被遮蔽、被边缘化的乡村文化的同时,还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的“空间转场”。网络直播、赚取打赏、网上卖货等,既是新媒体技术对乡村生活的重塑与改写,亦是村民利用新媒体技术对乡村新生活的自主性创造。

新媒体技术还为村民建立即时联系、构建云端交往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持,乡村社会资本在“云端”得以流动与共享。在“传统乡土文化不在了”“乡愁消失了”成为普遍担忧的今天,新型传播媒介成为村民守护乡愁记忆、重归“部落空间”、维系乡土认同的工具。借助中介化的媒介技术,村民可以跨越时空区隔,重建交往场景,传统乡村关系得以维系并衍生出新的关系形态。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推进,改变的不仅是农村农业生态和乡村人居环境,亦

将对乡村文化和价值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当电子政务、数字电商、智慧物流、“村播带货”成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传统乡村逐渐被数字乡村取代,乡村将不再仅仅是由经纬度定义的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演变为一个融合了现实与虚拟的“数字化乡村”。

(二) 数字技术赋能“新农人”连接城乡空间

近几年,国务院办公厅相继颁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等系列政策文件,把促进人才返乡、下乡、兴乡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内容,“城归”“新乡贤”“新村民”“新农人”等人才回流现象不断涌现。拥有城乡流动背景的“新农人”掌握数字技术,立足乡村开展电商创业,不仅是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实践者,而且以“半城半乡”的生活经验连接城乡空间,成为城乡信息沟通的中介。

截至 2024 年年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 1300 万人^①;“互联网+农业生产”“互联网+乡村旅游”等返乡创业案例层出不穷,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为农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注入活力。作为城乡沟通中介的“新农人”,通过创业促进资金、管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下乡,推动农产品出村进城;通过建立现代农场、生态观光景点,发展乡村生态旅游;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乡村文化,实现城乡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共享,促进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互信和理解^[10]。在创业过程中,“新农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带动村民形成现代价值观念,刺激乡村的现代化转型^[11]。

(三) 新媒体应用搭建城乡沟通的数字化平台

城乡二元结构下媒体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乡村曾被置于信息的孤岛,在信息化浪潮中落伍,处于信息社会的边缘。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流动性乡村社会”带来了乡村传统共同体的松懈和解构,导致了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缺失以及普遍的集体行动乏力^[12],由此造成乡村内部沟通不畅或无沟通。

经历了城乡二元—城乡失衡—城乡统筹的历史变迁之后,长期割裂的城乡关系因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而发生了深刻改变。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传播技术和各类新媒体应用在城乡社会的深度普及,为城乡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化支持,

包括赋能城乡数字经济发展、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进城乡文化认同等,也有望弥合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为改善城乡之间的“可沟通性”带来希冀。例如,作为一个智慧乡村信息服务平台,“腾讯为村”致力于中国广大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将曾经“失联”的乡村带进数字社会,与数字社会建立信息连接、情感连接和财富连接。进驻“腾讯为村”的7.9万个村庄、779.5万余名村民^②,在平台上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获得了数字化生活的能力以及和城市社会主动“连接”的能力。

但数字媒介应用对城乡差异的弥合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非线性,受到技术本身的特性、技术应用情境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城乡之间已有的数字化差距和个体数字素养差异,将影响到数字媒介对城乡“可沟通性”的赋能效果。推动新兴数字技术在城乡社会的普惠化和均等化,面向城乡社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城乡数字贫困群体的数字化利用能力、数字化交往能力和数字素养,是塑造城乡“可沟通性”的重要前提。

三、“可沟通城乡”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作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理载体,城乡空间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13]。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看,“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是一个克服城乡空间不平等,进行空间结构关系重组和空间整合的过程”^[14]。这一过程包括消弭城乡在空间结构上的二元分割,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保障城乡居民空间权利均等化,尊重城乡空间主体的需要与选择^[15]。

本文关注的城乡“可沟通性”,指向城市与乡村两大地理空间、农业与非农业两类产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群体。城市与乡村两大地理空间之间的“可沟通”,体现为通过现代传媒建立技术上的连接,创造开展公共交往的地理空间,形成交往共同体。农业与非农业两类产业之间的“可沟通”,体现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互惠交换,形成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的利益共同体。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可沟通”,体现为城乡个体之间有平等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并在交流与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共享价值认同的文化共同体。

(一) 基于空间社会学的设计思路

本文提出“可沟通城乡”这一概念,即是从空间

社会学入手,关注现代传播媒介嵌入城乡社会后对城乡空间的改造及对城乡关系的形塑。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较早提出“空间转向”的观点,强调“空间”不应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的“容器”或是“镜子”^[16],而是生产实践的过程及结果,是社会的产物^[17]。列斐伏尔主张“关系主义”的空间理论,认为只有互动才能赋予空间以意义,空间内的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传播技术深刻改变当代社会空间的当下,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提出“流动的空间”概念,意指传播技术对社会空间的全面形塑——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18]。

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出发,构建“可沟通城乡”的评估指标,需要将城乡社会的地理空间、信息空间和通过信息沟通而形成的意义空间置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讨如何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搭建城乡之间有效沟通的地理网络、传播网络和文化网络,实现城乡空间在物质层面的连接传输、社会层面的交往互动、文化层面的意义共享。因此,本文拟从城乡地理空间“可连接”(城乡之间公共交往通畅)、信息空间“可互哺”(城乡信息双向流动和互惠互利)和意义空间“可共享”(城乡共享文化价值观)三个层面设计“可沟通城乡”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 “可沟通城乡”评估指标构成

1. 地理空间“可连接”

城乡地理空间“可连接”,意味着基于城乡社区发展需求,城乡居民拥有开展具身交往的实体空间、线上交往的数字空间。本文将城乡地理空间“可连接”作为一级指标,下设“城乡居民信息意识”“城乡居民信息能力”“城乡物理资源连接”“城乡数字资源连接”4个二级指标。“城乡居民信息意识”下设“居民文化教育水平”“信息重要性感知”“接受新信息意愿”3个三级指标;“城乡居民信息能力”下设“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信息理解能力”“数字信息甄别能力”3个三级指标。“城乡公共场所”“城乡道路交通”作为“可连接”的物理资源,与以通信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资源共同构成城乡“可连接”的物质基础。

2. 信息空间“可互哺”

城乡信息空间“可互哺”,用以考察城乡居民通过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开展的信息互动的渠道、行为以及通过信息互动实现城乡资源协同转化的条件

和效能。本文将“城乡信息传播渠道”“城乡信息参与行为”“城乡信息协同程度”作为城乡信息空间“可互哺”的二级指标,将“大众传播网络”“组织传播网络”“人际传播网络”作为“城乡信息传播渠道”的下设三级指标。城乡居民通过这三类渠道在城乡社会空间中进行“文化信息参与”“政策信息参与”和“经济信息参与”,实现了城乡“信息共享”和“信息沟通”。

3.意义空间“可共享”

城乡意义空间“可共享”,意在考察城乡居民通过信息交流共享思想、意义与情感的效能以及由此

获得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本文从“地方认同”和“自我认同”两个维度评价城乡居民对城乡公共空间的接纳与依赖以及参与信息传播为个体带来的价值感和效能感。在“地方认同”的测量上,主要考察城乡居民对所处地方产生的功能性依赖和获得的安全感;在“自我认同”的测量上,主要考察城乡居民对自身传播行为的认可与满足以及对自身传播能力的评估和判断。

本文构建的“可沟通城乡”评估指标体系,由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22 个三级指标组成。评估指标体系详情见表 1。

表 1 “可沟通城乡”评估指标体系

“可沟通城乡”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地理空间“可连接”	城乡居民信息意识	居民文化教育水平	城乡居民对信息重要性的感知以及信息搜寻意识
		信息重要性感知	
		接受新信息意愿	
	城乡居民信息能力	数字信息获取能力	城乡居民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和技能水平
		数字信息理解能力	
		数字信息甄别能力	
	城乡物理资源连接	城乡公共场所	特定区域内供城乡居民会面、交流的公共场所数量以及公共场所的开放度、自由度
		城乡道路交通	城乡道路和公共交通状况,抵达公共场所的便利程度
	城乡数字资源连接	数字基础设施接入	城乡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网络、无线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多样性和普及程度
		数字化信息服务水平	城乡地区信息服务的普及率及效果
信息空间“可互哺”	城乡信息传播渠道	大众传播网络	城乡之间信息传播渠道的类别、数量及效率
		组织传播网络	
		人际传播网络	
	城乡信息参与行为	文化信息参与	城乡居民参与文化信息的实践
		政策信息参与	城乡居民参与政策信息的实践
		经济信息参与	城乡居民参与经济信息的实践
	城乡信息协同程度	信息共享	城乡信息共享的频次与效率
		信息沟通	城乡信息沟通的频次与效率
意义空间“可共享”	地方认同	地方依赖	城乡居民对所处地方产生的功能性依赖
		情感依附	城乡居民从所处地方获得的安全感
	自我认同	传播价值感	城乡居民对自身传播行为的认可与满足
		传播效能感	城乡居民对自身传播能力的评估与判断

地理空间(空间表象)与信息空间(空间实践)构成现实的空间,意义空间构成可能的空间。空间表象是空间呈现出的基本形态,空间实践是维持城乡社会空间的基本动力,两者构成城乡的可见空间,与相对处于遮蔽状态下的意义空间对立统一。

四、面向现代化的“可沟通城乡”建设路径

传媒本身既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又是“现代性”的基础条件和推动力量之一^[19]。在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数字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在重塑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现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建设面向现代化的“可沟通城乡”,需要依赖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城乡公共交往的地理网络、城乡信息互哺的传播网络和城乡共享价值的文化网络,以形成和谐的城乡关系,发挥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20]。

(一)城乡公共交往的地理网络

当前,连接城乡空间的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已经齐备,城乡居民开展实体空间的具身交往不再面临障碍或阻力,但基于“新基建”而开展的虚拟空间线上交往不仅稀少而且不通畅。本文所指的“新基建”,是相对于道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基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开展的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系统(设备、设施)和软件系统(算法代码、应用程序、标准规则)等^[21]。现代化语境下,城乡开展公共交往的地理网络,不仅仅指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所需的实体空间,更多是指基于“新基建”而开展的数字化交往空间。但目前城乡经济循环、资源交换的数字化空间尚不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信息分化依然存在,城乡居民在信息能力、数字素养上仍存在差距。特别是近几年数智媒体在城乡社会不均衡应用带来的“新数字鸿沟”,有可能加剧城乡之间的信息分化,在城乡之间再造“数字区隔”和“交往鸿沟”。

与传统“数字鸿沟”不同,城乡“新数字鸿沟”以数字化、智能化媒体的使用为特征,反映了使用者驯化数字技术为我所用的能力。下一步,应以弥合城乡“新数字鸿沟”为目标,持续推进包括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区块链等在内的“新基建”在乡村社会的深度应用。

第一,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数字化、智能化

改造,推动数智媒体与农民日常生活和农业活动的融合,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区隔和信息落差,为城乡公共交往搭建数字化的地理网络。

第二,拓展农业技术信息、城乡商品流通信息、科教文化信息、就业创业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渠道,为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交换提供数智化平台,营造城乡经济循环、社会交往的“数字公共空间”。

第三,以创业支持、项目扶植等方式,鼓励返乡创业青年以创新者的身份带动数智媒介在乡村社会的广泛应用。作为城乡公共交往的纽带,返乡创业青年能够以其“半城半乡”的生活经验,勾连城乡居民的日常交往,进而促进城乡交往的数字化转型。

(二)城乡信息互哺的传播网络

从媒介变迁的视角审视城乡关系,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喇叭的政策宣导、农村读报组的政治、文化教育,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电视下乡”,传媒在城市反哺乡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无形中塑造了不平等的城乡信息关系——信息由城市单向输入乡村,乡村在传媒报道中“集体失语”。21世纪以来,“互联网下乡”对乡村的赋权效应以及各种数字化应用在乡村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失衡的城乡信息关系,彰显了数字媒介在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力量。数字媒介的低门槛、去中心化、双向互动,将逐渐扭转城市单向反哺乡村的信息传播格局,推动城乡信息的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信息互哺的传播网络,进而促进城乡“可沟通”。

第一,建立城乡信息服务平台。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城乡信息汇聚中心,地方政务微信、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客户端等政务新媒体协同合作,共建信息传播平台,提供政府公告、新闻资讯、农副产品交易等公共信息,让城乡居民通过平台获取最新的城市和农村信息,并提供互动和反馈渠道,为城乡社区的信息互哺打通“最后一公里”。

第二,发展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地方政府可联合互联网企业共同开发面向地方居民的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建立用户社群、网络问政等联系群众平台;开发各类新媒体应用,将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公共事业服务和本地化服务等功能“一端集纳”,提供城乡居民交流互动、分享经验和信息的渠道,促进城乡之间的信息互动,在互动基础上产生信息互哺。

第三,以数字包容政策保障信息公平。实施数字包容政策,推动数字化资源的普惠和共享,实现信息作为公共服务资源在城乡空间的公平分配。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和设备在信息无障碍领域的应用,通过数字普惠降低技术使用门槛;面向数字贫困群体开展社区教育和技能培训,保障所有城乡居民在信息接入、信息应用上的可及、平等,并使其能够通过参与数字生活提升自身的能力,享受数字化发展的红利。

(三)城乡共享价值的文化网络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耕文明与现代、开放的城市文明之间长期存在着理解与交流上的隔膜。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型城乡关系的培育,需要相互信任、相互认同、城乡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现代数字媒介的开放、多元、互动特性,在搭建城乡价值共享的文化网络、培育城乡之间的价值共识上大有可为。

第一,培育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利用数字媒体打造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平台,将传统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产业,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多接触、了解和认同乡村文化的机会。

第二,建立城乡文化在线交流社区。在区域性社交媒体上开设在线社区,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建立微社区,为城乡居民提供交流、分享的平台。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知识分享,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文化隔膜,化解城乡文化冲突,增进城乡文化的互动、理解与认同。

第三,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合作。依托自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开展多样化的文化娱乐活动、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等,为城乡居民创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共享与价值认同空间。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社区支持农业”,吸引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走到一起,共同探讨农产品的绿色种植,在经济合作中增进彼此的文化互信和文化认同。

面向现代化的“可沟通城乡”,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而形成的“数字共同体”。在这一“数字共同体”内部,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信息壁垒和文化隔膜被打破,城乡资源得以共享与优化配置,城乡之间、个体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得到加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得到提升。开展公共交往的地理网络、实现信息互哺的传播网络以及共享价值的文化网络,共同编织了城乡沟通的意义之网。

结 语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预测了

城乡关系的未来: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4]689}。在城乡社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今天,“可沟通性”将成为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前提,“可沟通城乡”将引领城乡关系迈向共享发展、融合发展的未来。那么,应如何审视“可沟通城乡”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数字传播媒介在实现城乡“可沟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可沟通城乡”中蕴含了怎样的“友好城乡关系”?

第一,“可沟通城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高级形态。“可沟通城乡”的特征是借助数字传播媒介搭建城乡沟通的地理网络、信息网络和文化网络,从信息连接、信息互哺和信息共享3个层面塑造和谐的城乡关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并共同迈向现代化。作为城乡关系现代化的新形态,“可沟通城乡”基于现代传播媒介而搭建,并通过持续的信息交流和沟通而维系;现代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演进,将不断改写“可沟通城乡”的样貌,并塑造城乡关系的新形态;作为“可沟通城乡”的社会资本,信息将在交流与沟通中转化为资源、知识与权力,实现作为“货币”的价值。

第二,数字媒介是建设“可沟通城乡”的关键力量。作为推进城乡现代化转型“基础设施”的数字媒介,将在重塑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关系走向“可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依托数字媒介而搭建的“可沟通城乡”情境下,城乡社会借助数字媒介的工具性价值而实现物理上的连接与聚合,公共交往增加,文化价值共享,形成共在依存的利益关系;城乡信息资源的普惠化与均等化,将有助于发挥数字媒介的公共价值,促进城乡之间高效的信息沟通,打破城乡文化隔膜与认知区隔,形成信息互哺关系。数字媒介营造城乡共享的地方感、认同感和文化价值观,有助于形成共享利益、文化和价值的城乡“数字共同体”。

第三,“可沟通城乡”是尊重差异的“友好城乡关系”。基于数字媒介及其应用而形成“可沟通城乡”,将乡村从数字社会的边缘拉回中心,城乡携手走向融合发展的“数字共同体”,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友好城乡关系”的期待。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友好城乡关系”,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城乡关系,是尊重差异、均衡发展、功能互补的城乡关系,而不是罔顾城乡本身的内在矛盾发展规律,极力消弭城乡之间在

政策、资源、环境上的差异,追求无差别的城乡等同关系。从历史上来看,农村为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周期性危机提供了缓冲,成为城市发展的“稳定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可沟通城乡”并不意味着城乡差异的消弭,而是在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融合、共富、共享发展。

注释

①参见《这组数字好亮眼! 2024 中国“三农”成绩单出炉》,央视新闻公众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8904270308220111&wfr=spider&for=pc>, 2024 年 12 月 20 日。②参见“腾讯为村”公众号开发的“村级服务平台”小程序,入驻村庄、村民数量等数据的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社会主义论坛,2019(7):4-6.
- [2] 周飞舟.中国式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2-21(6).
- [3] 段进,张庭伟,尹稚,等.“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23(1):1-1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刘诗琪.信息技术能力的阶层分化与弱势保护[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3):71-77.
- [6] 陈柳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经济特质和价值旨归[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12.
- [7] 陈雪娟,胡怀国.中国现代化进程透视下的城乡关系演变[J].经

济纵横,2021(5):9-17.

- [8] 郭星华,刘朔.中国城乡关系七十年回望:国家权力的下沉、回缩与再进入——有关城乡关系变迁的社会学思考[J].社会科学,2019(4):81-90.
- [9] 赵文聘.数字公益:构建城乡共同体的一个新场域[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07(5).
- [10] 张新蕾,刘福军.我国新农人发展研究综述[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2):45-50.
- [11] 丁波.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J].求实,2022(3):100-108.
- [12] 周少来.乡村治理:制度性纠结何在[J].人民论坛,2019(3):51-53.
- [13] 苏景州,李宗明.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的理论与实践[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3):50-58.
- [14] 林聚任,刘佳.空间不平等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J].江海学刊,2021(2):120-128.
- [15] 林聚任.新城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72-81.
- [16]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20.
- [17]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Wiley-Blackwell,1991:26.
- [18]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 [19] 王东杰.作为近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报刊[J].史林,2021(5):14-19.
- [20] 李艳丽.双回归:重塑村庄共同体路径研究——以湖北省 B 村为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28-33.
- [21] 李晓华.面向智慧社会的“新基建”及其政策取向[J].改革,2020(5):34-48.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New Futur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Zheng Suxia Niu Binhua

Abstract: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relations serve as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advancing this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 long-standing digital divide has resulted in “related but separate” or “linked but un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established digital connec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owards “communic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relations exhibit thre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onnectable” geographical space, “mutually nurturing” information space, and “shareable” meaning space. This represents an advanced form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modern-oriented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relations, it requires establishing geographic networks for public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for mutual informational nourishment, and cultural networks for value consensus throug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media, ultimately shaping an urban-rural “digital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digital media

责任编辑:沐 紫